

关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张 十六世纪的中国地图

任金城 孙果清

1973年6月，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在整理中国古地图库藏时，“发现”有一幅带有“甲午仲夏（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山阴王泮识”字样的中国大地图。该图纵180厘米，横190厘米，绢底彩绘，颜色尚相当鲜艳，现已被列为该馆第一号地图收藏品^①。为此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德东布（Marcel Destombes）曾在巴黎召开的第29次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做了专题介绍^②。此后德东布又以《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张十六世纪的中国地图》为题，在1974年刊的《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二六二卷第一一二期上发表了更详细的介绍文章。《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六期又发表了该文的摘译稿^③。因此这一地图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

我国绘制地图有着极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地图不易保存，所以流传至今彩绘的大幅全国地图为数不多。据目前所知，传世的我国大幅全国彩绘地图以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杨子器跋《輿地图》为最早（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摹绘本）^④，现存法国的这幅地图则是仅晚于杨子器图的绘本全国大地图，它确实是我国制图史上一件罕见的珍品。经德东布的介绍，使埋没多年的珍贵古图得以从新为世人所知，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必需指

出，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知识的局限，再加上文字的隔阂，使他在关于图的名称、作者、时间以及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论述都存在不少的错误，这是需要加以澄清的。本文不想对德东布的文章做全面评论，仅对该图的基本情况做些简要的介绍，顺便对德东布文章中的错误提出我们的看法，并对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做些初步的分析。

一、地图的概况及其特点

这幅地图所绘的范围，东到朝鲜和日本，西到天山和大流沙，北到黑龙江和蒙古地方，南到南海。（见封二附图）图中主要绘出明王朝的两京十三省。周围的邻国如安南、朝鲜、日本、琉球等地也都标绘得很清楚。其他如占城、三佛齐、真腊、满刺加、暹罗等国则只标明“悉载正南海内”，而没有绘出具体的位置。和其他中国古代地图一样，该图绘出的自然要素也是详于水系而略于山脉。图中山脉只用弧立的山丘表示，而长江、黄河、珠江等水系则描绘得十分详细。黄河发源于星宿海，经过西北，华北至苏北的海州附近入海。长江中下游绘制得也比较正确，洞庭湖、鄱阳湖和四川盆地的诸支流都基本上正确，上游的金沙江也大致反映了出来，只是上源画成与黄河相通，显然是错误的，这可能是出自画师之误。

图上共标出各种地名五千多个。两京十三省及所属的152个府，240个州，1107个县，493个卫，2854个所，218个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诸司，以及重要的山脉、河流、驿站、村寨等几乎都标注了出来。为了弥补图中的不足，在图的边缘处还专门注出两大段文字做为补充。一处在图的上端，共有102行文字，列举了属于奴儿干都司的卫所名称（共标出建州卫等184个卫和20个所）。另一处在图的右下角，共有28行文字，列出了两京十三布

政司的基本统计数字，其中包括有省名、距京师的里程、省府以及省属各府名称、所属州、县的数字和各地应交纳粮食税的数字。看来该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映全国各级行政区域及城镇居民点等政治要素，属于政区地图性质。

除了说明以上一般概况和总的性质外，我们认为该图还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的特点值得注意。

1. 采用了分省设色的方法。图中用不同的颜色分别表示出两京十三省的范围，所以不用标明省界就可把全国十五个省级政区及地区间的领属关系表示得一清二楚。例如把海南岛与它所属的广东省同样都染成了红色，辽东的颜色与山东省完全一致，反映出明代后期山东与辽东的领属关系。图上唯一没有涂色的地区是日本，这也反映出日本与朝鲜、安南不同，它不是中国的属国，所以图上没有涂色。这种以不同颜色来区分政区范围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地图中是非常罕见的，它标志着地图表示方法上的一大进步。

2. 地名丰富翔实，并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出各城镇的规模和性质。图中共标出府、州、县、卫、所、驿、寨及山、河等各种地名五千多个。地图的作者还用不同的符号把不同规模的居民点加以区别：两京（北京和南京）用带城墙符号的黄色八角形来表示；省的首府用带城墙符号的红色方格表示；府用所在省同样颜色的双线长方格表示；州用椭圆表示；县和卫、所、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诸司等都用单线长方格表示。全部地名都写在上列各种不同形状的符号内，使各地的性质和规模一目了然。在一幅全国地图中能容纳这样多的地名，特别是各地卫、所、驿寨等小地名如此丰富，各级地名如此层次清晰，在古地图中也是极少见的。但是由于缺乏对地名的综合取舍，又加上地名都写在了符号内，结果整个图幅被密密麻麻的地名占满，使图面不够疏朗清晰，而其他地理要素也相对地减弱，是其美中不

足。

3. 是艺术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结合。图中没有运用计里画方，但是整个地图的轮廓和海岸线还大体正确。所以德东布认为“这张地图画得相当准确，各省及其首府的标位也很精确。各省之间所用的比例尺差别不大，基本上都是一比一百八十万单位。这就证明了当时中国高度发达的制图术。”^⑤这一评价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是西北和西南边缘部分的误差较大，黄河、长江上游的图形也有些失真。我们认为值得提出的是该图在注意各地之间距离和方向相对正确的同时，很注意地理要素的形象化和整幅图面的艺术性。例如所有的河流和湖泊都画成了浅兰色，而黄河则涂成黄色。山脉都画成形象的山丘，底部染成棕色，而山顶则染成绿色。特别是西部的高山峻岭和东南的低缓丘陵都表现得很清楚，四川盆地也非常醒目。万里长城的表示方法和其它地图不同，直接用灰色的高墙表示，它象一条巨龙蜿蜒于山岭之间，非常壮观。海洋则绘成碧绿的波浪，这样整个东部和南部形成一片碧波荡漾的海面，和山峦起伏的大陆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整幅地图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因此它不仅是一幅内容丰富，科学性较强的全国地图，同时也是一幅反映祖国壮丽河山的艺术珍品，是艺术性和科学性融合为一体的杰作。

4. 朝鲜和日本绘制得非常详细而比较正确。在明代地图中，朝鲜和日本往往画得非常粗略，唯有这幅地图，则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图中朝鲜半岛的轮廓已经非常接近现在的形状，只是比例有些过大，因此显得过于突出。整个朝鲜半岛清晰地标出各级地名达三百六十多个，并用不同颜色标出八个道一级行政单位。这在明代地图中是非常罕见的。一般说来，直到经过实测编绘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问世以后，朝鲜半岛才开始出现这一轮廓。此外日本列岛的轮廓也基本上接近正确，只是比例过小了。整个日本共标出地名75个，其中称为州的就有60个。在明代

著名的《广輿图》中，虽然单独绘出了朝鲜和日本图幅（日本图幅是在嘉靖四十年的胡松刻本中根据郑若曾图增补），但是无论从图形轮廓和内容翔实程度来看，都较此图大为逊色。在明代地图中，朝鲜画得如此突出和详细，确实值得注意。看来这一部分很可能是根据朝鲜人的材料绘成的，这一点下面还要进一步说明。

以上可以看出该图是传世的明代地图中地名最为详尽、艺术性和科学性结合得最好的一幅大型全国地图。

二、关于地图的名称、作者及版本

这幅地图没有明确地标出图名，因此德东布给它定名为“1594年王泮的中国图”，并且认为它就是王泮图的“原本”。其实认真阅读该图右下方的两段说明文字，以上问题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我国家全抚方輿，一统为盛。文襄桂公有《輿地图志》，念庵罗公有《广輿图》，而皆载在方册，分天下为十五道，未若此图广大，悉备一览，而幅员形胜举在目前也。吾友白君可氏得此图于岭表，不敢自私而侵梓以传。经世者披图按索，而疆理之宜，修攘之策，了然胸中，未必不为是图为桂、罗二公志輿图之羽翼也。君可氏之□□矣。是图也，具侵两都十三省，泊都省所隶府一百五十有二，州二百有四十，县一千一百有七，卫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八百五十有四，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诸司二百一十有八。都省而外，朝贡归王，若朝鲜、安南等五十六国，速温河等五十八岛，奴儿干、乌思藏等都司所辖二百三十八区，靡不□列若星布云。甲午仲夏山阴王泮识。”

“《天下輿地图》一本。旧行于国中，经变之后，不复见矣。近得印本《輿地图》八幅，山阴王泮识之。天朝视我东，不

童内服，雨露所沾，舟车所通，目不及睹，足不及履，则写之为图，一便览了者诚不可一日无也。今因是图，更考《大明官制》、《一统志》，则两京及十三省、府、州、县、卫、所互有增减。□此略正约于一，附以我国地图，以见天朝一统之大，于今为盛也。至于日本、琉球、奴儿、忽温之属，并志其地，后之览者不可不知是图之所始”。

以上第一段文字是王泮为地图写的识语。文中首先提出文襄桂公（萼）的《輿地图志》^⑥和念庵罗公（洪先）的《广輿图》来衬托本图的特点。因为桂、罗二公的地图是明代流传极广的权威性地图，但是它们都是小幅分省地图集性质，因此不如“此图广大，悉备一览，幅员形胜，举在目前也”。下面则系统地提出本图的来源，刻印的经过和目的，以及包括的范围和内容等。可惜文中对本图的说明虽详，但是却没有指出本图的具体名称。

第二段文字德东布认为也是出于王泮之手。其实不然，它是由一位未署名的摹绘者所写的补充说明。文字的内容也是先举出一幅曾经流行于国内的《天下輿地图》，但是“经变之后，不复见矣”。文中接着提出“近得印本《輿地图》八幅，山阴王泮识之。……”显然这里所说的共有八幅木版印成的大幅《輿地图》，就是由白君可氏“侵梓以传”，并由王泮题识的这幅地图。因此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这幅地图的名称应是《輿地图》而不应该是其它。

关于地图的作者。在王泮的识语中仅仅提到“吾友白君可氏得此图于岭表”，而没有提及该图的作者，看来原图作者在当时已经无从可考了。此外与本图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只有白君可和王泮二人。白君可是该图“侵梓以传”的刊者，而王泮则是该图识语的作者。值得指出的是王泮为明代深知地图之重要并对地图的传播起过积极作用的著名官员兼学者。据文献载，王泮字宗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嘉靖十八年（1539）生，万历二年（1574）中进

士，八年（1580）任广东肇庆知府，十二年（1584）迁岭西按察司副使，仍驻肇庆，十六年（1588）迁湖广参政^⑦。他在肇庆期间结识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并对利氏绘制的世界地图很感兴趣，请利氏“尽译原图上之注释，且拟刊印以布全国”^⑧，利氏来中国后第一次绘制的《山海輿地全图》就是王泮在肇庆替他刊行的^⑨，并在图上写上了他的名字和官衔，作为礼品用来馈赠要人。正是由于他深知地图之重要，所以十年以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又为白君可氏刊印的《輿地图》题识，使该图更加被人重视。现在该图的原作者早已失传，按传统习惯，冠以王泮之名也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为了与原作者有所区别，我们认为著录为“王泮题识《輿地图》万历二十二年白君可氏刊本”比较恰当。

但是这个王泮题识，用八幅木版刊印的《輿地图》尚不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彩绘本地图。换言之，法国图书馆珍藏的这幅地图的版本并不是《輿地图》的“原本”，而是后人的摹绘增补本，这在第二段文字说明中可以得到充分地证明。可惜写这段说明的人没有署名，这是非常遗憾的。虽然如此，但是经过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这段说明文字和这幅彩绘地图都是出自一位未署名的朝鲜作者之手，其主要根据如下：

第一、文中把明王朝称为“天朝”。据一般习惯，明王朝的臣民称明朝为“皇朝”、“皇明”、“大明”而不用“天朝”，只有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属国的臣民才尊称为“天朝”。此其一；

第二、文中提“天朝视我东，不啻内服……”，显然是位于我国东方的一个属国的臣民的语气，而不会是出于明王朝的臣民之口。此其二；

第三、“今因是图（指王泮题识《輿地图》）更考《大明官制》、《一统志》……□此略正约于一，附以我国地图，以见天朝一统之大，于今为盛也”。这就说明摹绘者不仅摹绘了王泮的原图，而且还做了一些订正，并增补了“我国地图”。这里所说的“我国地

图”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国名,但是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位于我国东方的国家只有朝鲜、日本和琉球,而日本并不是中国的属国,琉球虽然向中国纳贡称臣,但是图上画得非常简略。结合本文第一节所指出的图中朝鲜半岛绘制得如此详尽而精确,并有意地放大了比例等现象来看,这个国家一定是朝鲜无疑,而这段补充说明文字和这幅摹绘增补的地图,也一定是出自一位朝鲜作者之手。所以法国图书馆藏的这幅地图的全称应是:“王泮题识《輿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

这里我们还要补充说明,指出了该图并非原本,而是朝鲜人的摹绘增补本,丝毫不会降低该图的历史价值,相反,它在中朝地图学术交流史上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朝鲜是中国的近邻,中朝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地图科学交流方面也不例外。朝鲜非常注意搜集中国地图。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是非常多的,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关于“熙宁中(1068—1077年)高丽人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⑩的记载。在《李朝实录》中也有着关于朝鲜搜集中国地图的大量记载^⑪。

有明一代,两国地图的交流更出现了新的高潮。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极,朝鲜派贺使金士衡来朝,回国时将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清濬的《混一疆理图》带回朝鲜,至建文四年(1402),由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图和日本图,从而合成新图名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⑫。后来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濬的《混一疆理图》原图都已失传,幸赖朝鲜李荟、权近改绘增补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得以间接流传^⑬,成为中朝地图学交流史上一段佳话。今天王泮题识的《輿地图》印本也早已失传了,而且在文献中也没有留下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如果不是这个朝鲜摹绘本的存在,恐怕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有过王泮题识的《輿地图》。因此这

个朝鲜摹绘本的存在和发现确实难能可贵，它不仅使王泮题识的《輿地图》免遭湮没，而且也给中朝地图学交流史上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三、关于各种版本的绘制时间

关于此图的绘制年代及其源流，在王庸先生的《中国地图史纲》和《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中都没有提到，在一般明代典籍和名家藏书目录中也不见著录，现在只能根据图上仅有的两段说明文字和图中的政区建置与地名变迁来加以分析。

从两段说明文中可以看出关于此图共有三个版本：第一是“原本”，即“吾友白君可氏得此图于岭表”的原图。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可称之为“輿地图甲”，即该图的第一代母本。第二是“印本”，即白君可氏根据得自嶺表的原图“而钺梓以传”并有王泮题识的印本，可称为“輿地图乙”，即该图的第二代——“印本”。第三，是朝鲜某学者根据有王泮题识的印本《輿地图》加以考订增补而成的“绘本”，即“今因是图，更考《大明官制》、《一统志》……□此略正约于一，附以我国地图”的摹绘增补本，可称为“輿地图丙”，即第三代——“绘本”。遗憾的是现在该图的原本和印本都已经失传了，只能从现有绘本图中加以分析。

从现有绘本輿地图上的政区建置和地名变更情况来看，图上反映最晚建置的时间仅到隆庆三年（1569），而万历年间及其以后的建置，图上都没有反映。

现将一部分能说明问题的重要建置的变化及图上反映的情况列表如下：

地区名	建置时间	图上名称
河南归德府	嘉靖24年6月升为府 ^⑭	归德府
四川龙安府	嘉靖45年12月改龙州宣抚司置龙安府 ^⑮	龙安府
贵州贵阳府	隆庆3年3月改府名贵阳 ^⑯	贵阳府
江西赣州府长宁县	万历4年析安远县地置长宁县 ^⑰	无
广东廉州府安东县、西宁县	万历5年置安东县、西宁县 ^⑱	无
江西建昌府泸溪县	万历6年改泸溪巡检司为县 ^⑲	无
陕西长武县	万历11年以邠州宜禄镇置长武县 ^⑳	无
贵州定番州	万历14年以程番长官司置定番州 ^㉑	无
四川马湖府屏山县	万历17年置屏山县 ^㉒	无
山西汾州府	万历23年升为府 ^㉓	汾州
贵州铜仁府铜仁县	万历26年改铜仁长官司置铜仁县 ^㉔	铜仁长官司
广西太平府永康州	万历27年永康县升为州 ^㉕	永康县
贵州思南府安化县	万历28年以水德长官司改置安化县 ^㉖	水德江长官司

从上表来判断，该图的中国部分所反映的时间约在隆庆三年至万历三年（1569—1575）之间。这个时间很可能就是白君可氏得自岭表的“輿地图甲”的绘制时间。

关于印本“輿地图乙”的绘制时间，从现有绘本图的内容来看，白君可并没有做任何修订和补充，只是“侵梓以传”，并请王泮题识。这里王泮署名的时间“甲午仲夏”（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可以视为是刊印的时间。当然具体刻版和印制完成的时间可能是万历二十二年，也可能略迟于二十二年。

至于绘本“輿地图丙”的时间则不可能从图上府州县的建置变迁来判断。因为从绘本图的内容来看，朝鲜学者在绘制此图时并不一定如识文中所说“更考《大明官制》、《一统志》，则两京十三省府县州卫所互有增减，□此略正约于一”。如上所述，万历年间的建置图上都没有反映。不但如此，连原图上已有的误差，仍照样出现在图上^②。同时在图的右下角注释的府名和州县数字与图中标出的名称和实际数目也不一致，^③并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如下表：

北直隶	真定府、顺德府	真德府
南直隶	松江府	松京府
江西省	南康府	南江府
湖广省	德庆府	德安府
湖广省	常德府	尚德府
广西省	田州府	四州府
四川省	镇德府	无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如果摹绘时认真参考了《大明一统志》的话，以上现象是不应该发生的，看来摹绘人在绘制地图的中国部分时只是按万历年以前的原图照搬照绘（实际上，白君可刻印时也是照搬原图）。但是在中国边疆地区则可能参考了《大

明一统志》，如在图的上端列举的奴儿干都司卫所名称共有二百零四个，这个数字则与《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记载的情况相同，而在《明史》卷九十和万历时修的《明会要》都记载奴儿干都司的卫所数到了万历年间已经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又如在安南国部分，图中虽然绘制得很简单，但是仍标注出“安南属州四十一，镇府十七，州五，县一百五十七”，与《大明一统志》记载完全一致。

看来摹绘本的主要重点是增补了朝鲜和日本部分。这肯定是摹绘者根据其它地图资料增补上的。至于这部分资料的来源，由于我们尚没有见到文献记载，又加上我们所见到的影印件上，朝鲜和日本地方不很清楚，所以目前尚无法判断。

现在仅根据该图的部分内容，结合时代背景来分析，摹绘的时间可能在万历后期是较有把握的。

从朝中两国关系的历史来看，朝鲜很久以来就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有明一代与明王朝贡使不绝。万历二十年（1592年），刚刚完成日本初步统一大业的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占领了朝鲜大部国土。朝鲜举国抗战，并遣使明朝求援。同年七月，明朝派兵援朝。在朝中两国军民互相支援下，经过七年（1592—1598）的艰苦战斗，终于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朝鲜^②。中朝两国在反对侵略者的战斗中，结成了更加紧密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系。

此后在中国东北的建州卫女真酋长努尔哈赤逐步统一各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天启七年（1627）出兵侵入朝鲜，后在人民抵抗下停战议和，约定朝鲜必须在后金和明朝之间严守中立。崇祯九年（1636）后金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同年十二月再次侵入朝鲜。崇祯十年（1637）朝鲜降清，被迫定盟，共同反明。^③

从以上历史背景来看，朝鲜降清反明后，甚至在保持中立的

1627年起已经和明王朝断绝了联系。而图上某朝鲜学者所写的第二段补充说明文字中仍称明朝为“天朝”，而且均抬头顶格以表示对明王朝的尊重。由此可以判断该图摹绘增补的时间绝不会晚于1627年。又从说明文中“……附以我国地图，以见天朝一统之大，于今为盛也。……”来判断，摹绘地图的时间和写这段补充说明的时间很可能在中朝联合抗日七年（1592——1598）战争（朝鲜史学家称为“壬辰卫国战争^③”）取得胜利之后。又从图中日本部分来看，日本除注出地名75个之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把“江户”（今东京）和“倭京”（今京都）同样列为一级中心城市。这可能标志着德川家康已经建立德川幕府（1603——1861）（亦称江户时代），因此该图摹绘增补的时间上限应是1603年。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如下：

1. 该图的原本（“舆地图甲”，即白君可氏得自岭表的原图）其成图时间约在隆庆三年到万历三年（1569——1575）之间。

2. 该图的印本，（“舆地图乙”）其刊印时间约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前后。

3. 该图的摹绘增补本（“舆地图丙”）绘制时间约在万历三十一年至天启六年（1603——1626）间。

四、和其它明代地图的关系

明代是我国古代地图学发展的极盛时期，一方面罗洪先的《广舆图》在元朱思本图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地图集；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发展，政区图、形势图，边防图、海防图、航海图、交通图、水利图等各种专题地图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那么王泮题识的《舆地图》究竟属于哪一个系统？它和其它明代地图的关系如何呢？在王泮的识语中曾提到“经世

者披图按索，而疆理之宜，修攘之策，了然胸中，未必不为是图为桂、罗二公志輿图之羽翼也。……”看来王泮认为该图属于桂、罗二公地图的系统。当然桂萼的《大明一统輿图》（亦称《皇明輿图》）和罗洪先的《广輿图》是先于王泮题识《輿地图》的重要图籍。毫无疑问，该图肯定会参考过桂、罗二公的地图。但是认真加以比较则可发现两者无论在图的内容、性质和绘制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面已经说，明桂、罗二公的地图属于分省地图集性质，而王泮图则属于政区图性质的全国一览图。从绘图风格来看，罗洪先的《广輿图》是以元朱思本的《輿地图》为底本，并继承发扬了我国传统的计里画方之法，创造性地运用了较科学的规范化的图例符号，以保证了地图的高度科学性，^②而王泮图则继承发扬了我国另外一种传统的绘图方法——山水画法，^③比较注意地图的艺术性和自然要素的形象化，但是由于没有运用计里画方，所以各地理要素之间的位置和距离不够准确。由此看来，王泮题识的《輿地图》与《广輿图》迥然不同，而属于另外的系统，即在山水画地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象化地图的系统。

王泮题识的《輿地图》也不同于以《古今形胜之图》为代表的形势地图和沿革地图。王泮图除了在图的边缘部分注出两段文字注释外，在图的中间只标注地名而没有一处注释文字；而《古今形胜之图》和沿革图等则往往在图中标注出大量注释文字。^④

和其它明代地图比较，从内容性质和绘制风格特点来看，它更接近杨子器跋《輿地图》。与杨子器图对照，两图不但大小相近，轮廓形式相似，内容都是以两京十三省和府州县地名注记为主的政区图，而图的识跋文字格式与所列府州县的数目也几乎相同^⑤。如果再以绘制的风格来看，两者都很注意各种地理要素的形象化和艺术性。由此可以判断，王泮图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参考过杨子器图，并属于同一系统。这种在山水画法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形象化地图已经不是原始的山水画图了，而是在和计里画方地图长期共存的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吸取了计里画方图的科学基础，把地图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融合为一体的一种地图。由于它更适合于宫廷和官府的需要，因此在明清两代官方地图中占了很大的优势，如清内阁大库收藏的大批地图^⑥，基本上都属于杨子器图和王泮图的系统。由于以往见到的山水画式地图，往往科学性都较差，所以有人认为“明代舆图，多渊源于元朱思本图，……其非朱图系统之下者，大抵皆官府中传统绘法，在地图史上无特殊意义。……”^⑦从近年来发现和发表的一些明代地图的情况看，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这种形象化的地图不但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在科学性方面也可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杨子器图和王泮图的存在和发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总之，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这幅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是明代《广舆图》系统以外的又一重要地图。它是明代政区地图中较精密的一幅绘本全国大地图。尤其是它保存了王泮图的主要精华，又增补了朝鲜和日本部分，为传世的明代地图中，中朝日三国画在一起的最佳地图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末中朝两国关系极密切时期的地图实物，也是中朝两国地图交流史上又一光辉的篇章，不仅对研究明代后期的各省及府、州、县、卫所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李朝中期的朝鲜地理情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注：

①见《Journal Asiatique》Tome CCLX II, 1 / 2 (1974) P193—212。并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六期，第27—33页。

②会议发言摘要发表在1974年1月出版的《美术杂志》(Gazettee

des Beaux—Arts) 第62—64页。

③见注①

④见郑锡煌：《关于杨子器跋舆地图的管见》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1期（1984年）。文章认为“杨图的绘制时间当在公元1512—1513年间”。可能是指原图的绘制时间，可惜原图早已失传，现在旅顺博物馆藏的杨图实为嘉靖五年（1526）摹绘本。

⑤《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六期，第28页。

⑥德东布文章中认为“桂公的地图……至今连一幅也没有保存下来”，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明万历七年何镗刊的《修攘通考》一书中就全部刊出了桂萼的地图和图叙。关于此图的名 称各书 著录也有很大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存目为“舆图记叙”，《明史·艺文志》称“明舆指掌图”，《千顷堂书目》称“大明舆地指掌”，在《修攘通考》中，该图卷端所刊奏稿中则称“大明一统舆图”，而在奏稿以下各页版口又均称“皇明舆图”，在王泮的识语中则称“舆地图志”，其实所指的都是同一地图。

⑦关于王泮的传记，详见：光绪《肇庆府志》卷十二（职官）；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乡贤）；《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一。

⑧见洪煊莲《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载《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3、4合期第7页。

⑨据曹婉如等人的《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载《文物》1983年12期第58页）称由王泮刊印的世界地图，目前尚未发现。但万历十三年章潢撰《图书编》卷二十九有《舆地山海图》，又《苏州府志》载“山海舆地图，中承赵宁刻，在姑苏驿”，此二图皆以王泮刊印的利氏《山海舆地全图》为兰本。又据德东布文载“这些图中有几份用白丝绸裱糊之后寄到了罗马和马德里”。

⑩见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三。

⑪《李朝实录》中关于中国地图的记载很多。例如：《中宗实录》卷十三、六年八月（正德六年）己丑载：“弘文馆进《天下舆地图》”……。卷三十六、十四年五月（正德十四年）庚申载：“命纳《大明舆地图》于内……”。卷八十七、三十三年六月（嘉靖十七年）癸卯载：

“海阳君尹熙平以《皇明一统地理图》入启曰：……朝鲜地略书于海隅之中……”。

⑫见《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权近的跋文。载《韩国古地图》第188页，韩国图书馆学研究会1977年出版。

⑬《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原图也已失传，现藏日本龙谷大学的一幅为1500年左右的摹绘本。

⑭⑮《明史·地理志》卷四十二。

⑯《明史·地理志》卷四十六。

⑰《明史·地理志》卷四十一。

⑱⑲⑳㉑㉒㉓㉔《明会要》方域四

㉕㉖《明会要》方域三

㉗如广西的田州府，嘉靖七年已改为州，而图上仍绘成府的符号。

㉘据右下角注释文中各省的府州县数总计共有196府，290州，1033县。而在王泮识文中则是152府，240州，1107县。

㉙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508—5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1月第二版。

㉚同上第509—510页。

㉛1592年是壬辰年，朝鲜史学家称1592—1598年的战争为“壬辰卫国战争”。

㉜我国古代地图中，运用地图符号的历史很早，但是《广舆图》系统地制定了24个规范化的符号图例，可以节省大量文字和空间，因此能保证图面的清晰和重点突出，是制图学上一大进步。

㉝我国山水画式的地图由来已久，如果除了《山海经图》不计外，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有了画着山水的地形图了。魏晋以来兼有山水画和地图性质的作品大量出现，直到后来方志中的大批地图都属于这种性质。（参见，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四章）

㉞见任金城：《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胜之图》，载《文献》丛刊第十七辑。在《古今形胜之图》中，共有文字注释一百四、五十条，总计约五千多字。

㉟据杨子器跋文载：“……观夫两京畿之相望，十三省之环，百五十二府、二百四十州、一千一百二十七县之系属，四百九十三卫，二

千八百五十四所，交错布列为之保障。若宣慰司十二，宣抚司十一，招讨安抚司十九，长官司百七十七，亦莫不革其野心，以听省府约束。外若朝鲜、安南等国五十六，速温河等地五十八，奴儿干、乌思藏等都司所隶二百三十八，亦皆恭奉朝贡，一统之盛，万古仅见……。”以上跋文与王洋的识语对照，则不仅文字格式相似，而所列府州县的数目也几乎相同。

③⑥见《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印本。

③⑦见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第8页。商务印书馆1953年重印第一版（修订本）。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翁同和的“五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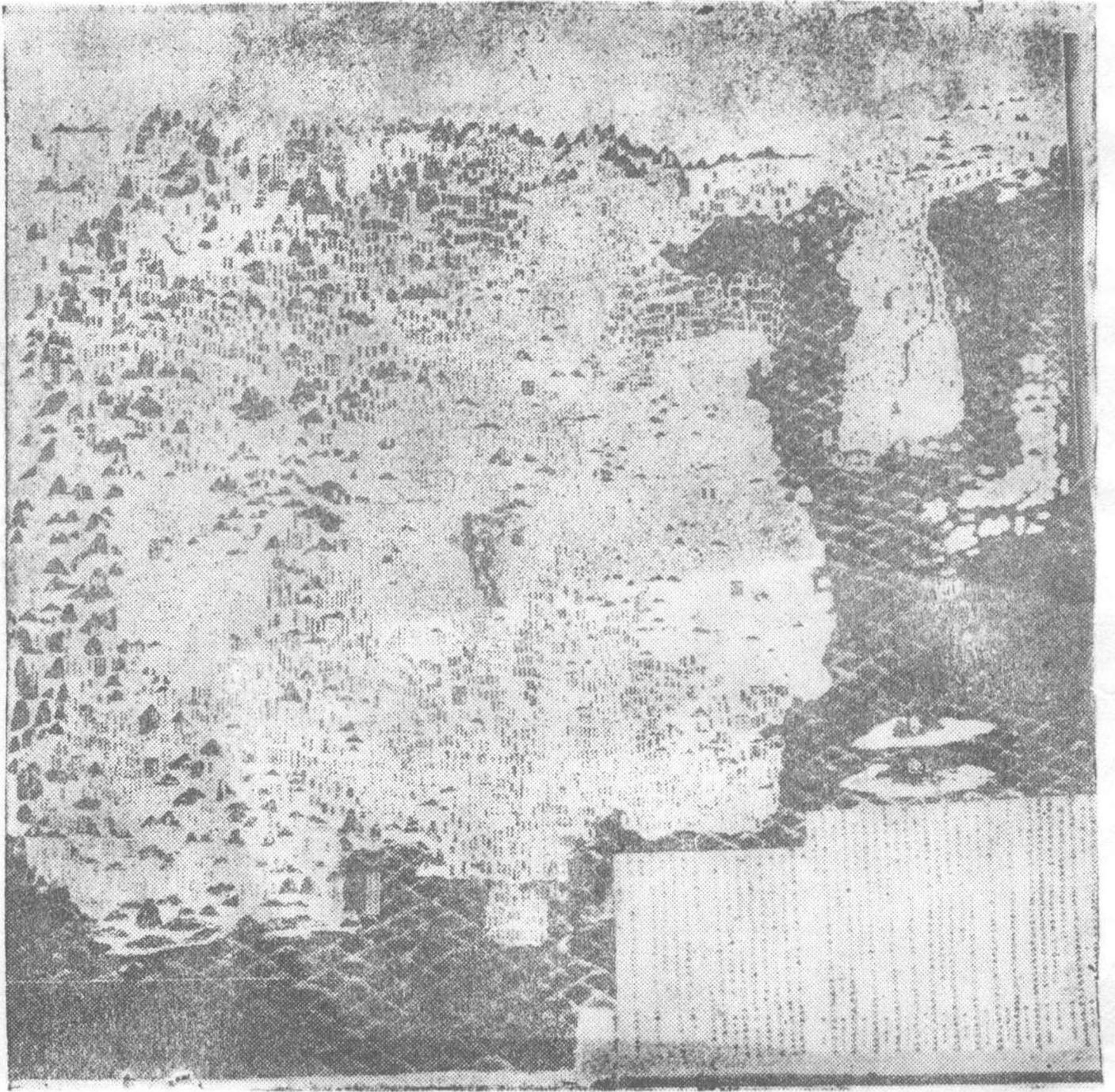
北京图书馆藏有清翁同和亲笔字一方，长宽均约13厘米，自右至左写下了五条类似箴铭的语言：

不赴宴会 不管闲事 不应笔墨 不作荐书 不见生客

翁同和是支持“康梁变法”，于光绪二十四年被慈禧太后下令“著即开缺回籍”的。但这似乎并没有结束对翁同和处置，同年，随着慈禧太后政变的成功，又追加其罪名，“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和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最终地结束了翁同和的政治生涯，直到光绪三十年去世。结合上述情况推测，翁同和的“五不”，有可能就是在“开缺回籍”以后写的，也是常说的“韬光隐晦”的表现，或失意情绪的寄托吧！

翁同和“书法自然一家，尤为世所崇”，其传世之作不少，但亦时见赝品。上述翁书之“五不”，以笔意衡之，应出翁手。所书内容也算是翁晚年的一份小资料吧。

薛 英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我国十六世纪地图

封面题字：茅 盾

封面设计：红 焰